

文坛

西北风

过耳

——“陕军东征”
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

陈传才 周忠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坛西北风过耳

——“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

陈传才 周忠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2123 1

(京) 新登字 156 号

文坛西北风过耳

——“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

陈传才 周忠厚 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53 000

印 张：7.25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12 000

书 号：ISBN7-300-01868-8/I·111

定 价：7.00 元

352-355 113X6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晋	冯丽君	李松刚	李 成
许 鹏	侯 锦	杨英杰	胡 海
崔振椿	潘天强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	(1)
第二编 思想艺术特征透视.....	(16)
一、“陕军东征”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 涵,文化氛围及市场作用.....	(16)
二、“陕军东征”作品的宗教观、哲学 观、历史观和道德观.....	(43)
三、“陕军东征”文学作品的文化历史 意识和叙事方式.....	(77)
四、“陕军”笔下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	(108)
五、“陕军东征”与中外文化影响	(123)
第三编 代表作品解读.....	(143)
一、命运悲歌:生存抑或毁灭?	(143)
——《八里情仇》析论	
二、历史的创造与创造的历史.....	(154)
——《最后一个匈奴》简论	
三、城·乡村·文化市场.....	(165)

——《废都》三谈	
四、生命的矫情	(176)
——《热爱命运》解读	
五、世界真奇妙 “卖淫”也有假	(185)
——《骚土》的性文化骗局剖析	
六、神话的诞生与死亡	(195)
——《白鹿原》神话解读	
七、人性悲剧的文化反思	(211)
——《兰袍先生》评析	
后记	(222)

第一编 总 论

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文坛在高扬时代主旋律的同时，越来越朝着多种文化向度和审美价值追求的目标趋进；虽然严肃文学在通俗文学热的冲击下，显得有些窘迫和尴尬，但仍出现了不少具有新的审美价值特征的作品。尤其是 1993 年，以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陕军”东征，在文坛和社会各界引起“爆炸性”反响后，严肃文学也似乎从沉寂中活跃起来了。尽管人们对于“陕军东征”文学现象褒贬不一、看法殊异，但作为一种重大的、有影响的文学现象，其审美价值追求和艺术特征是值得认真探究和评析的。

我们以为，“陕军东征”这个并不科学的概念，不仅泛指近年来陕西作家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而且标志着这些文学创作无论在审美价值取向或文本范式的构建方面，有着迥异于先锋文学和写实小说的新探索。同时，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及其人文景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对于这种文学现象的评价，主要地应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入手，而不只是着眼于“市场效应”，因为文学

是以创造审美价值为其特质的。透过作品文本建构及其审美意蕴的解读，才能辨析其审美文化内涵，探究其艺术追求是否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能否适应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审美走向。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不揣冒昧地试图对“陕军东征”文学现象作出我们的评析。

(一)

构成“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品，除《白鹿原》和《废都》外，还应包括《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骚土》、《热爱命运》、《兰袍先生》等作品。虽然它们在描写内容和表现风格上各各特殊；但就其观照社会现实、反思历史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艺术表现方法看来，却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它们力求改变以往那种客观地描述历史、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塑造人物形象的传统模式，代之以文化的视角、生命本体的视角去透视历史和现实，探触人物心灵的深层底蕴；从而或多或少地淡化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与时代的发展趋势，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历史的动荡变迁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往往不是通过社会历史的演变来揭示人的性格与命运，而是通过描写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灵魂的呼号、煎熬与挣扎，去折射社会历史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白鹿原》和《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把小说当作“一个民族的秘史”加以描写，立足于陕北地域文化景观的营造，形成“大文化”背景下史诗文本范式，以展现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神秘而诱人的心灵史。如同《最后一个匈奴》后记所述：“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

谜、存在之谜，就隐藏在作者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一个个陕北高原村落——吴儿堡、八里、鄯窑村、杨徐村，以及与高原村落紧密相连的A城、西京，便成了作家们营造的“文化场”中最具地域人文景观，且隐含着民族和个体的生存发展内在契机的艺术符号、代码。

那么，透过对《白鹿原》为代表的，追求表现“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史诗文本范式的解读，我们窥视到作家哪些新的艺术探求呢？

首先，从《白鹿原》营造的地域文化景观来看，确实是富有特色和诱人的。然而作品所渲染的农耕、季节、民俗等奇观，却是为了展现白鹿原充满性与暴力的神秘史，即始终摆脱不了世代相承的家族争斗和性情结的纠葛，及其必然造成的变幻浮沉的“历史轮回”的命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文景观和史诗式的情节结构，虽然也涉及了有关正史的一些描写，如大革命、抗日战争、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乃至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等等；但文本的主干仍是白、鹿两家的家族关系，以及两代子孙为争夺在白鹿原的地位而翻云覆雨的对峙、融合、分裂的历史，以及充满爱与恨、亲与仇、生与死的心灵搏击的感情波澜。这部分正史的内容尽管加强了两个家族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让这两家国、共掺杂，使“秘史”的神秘感和历史的现实感相融合；但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中却始终无法融合起来，因为推动秘史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是积淀着民族生命活力的性情结，由此而出现鹿兆谦出走、白孝文沉沦、鹿三老汉血刃田小娥……的故事；而革命如何影响两家的不同人物，如何改变着民族的命运，不仅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是迷乱混浊的，以致把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与家族中的父

女反目、兄弟相煎及其相关情节组合在一起加以描写；这样，正义与非正义、革命及其失误、高贵与卑贱的界限，都在这些缺乏阶级特性和政治、道德是非的人的飘忽不定的情感变化中消解了。这样的史诗文本，能深刻揭示民族心灵史吗？文艺史上又有哪一部民族史诗可以脱离它与总体的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巴尔扎克所追求的，是那种反映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民族秘史或史诗。

其次，在这个淡化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史诗构架中，处于人物复杂关系核心的白嘉轩，是直接影响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主人公，更是家族秘史乃至民族秘史灵魂的体现者。作品一开头关于白嘉轩一生连续娶了七个女人的描写，既显示了他的强悍性格与活力，又象征着白鹿文化的永恒生命力，暗示着这位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完美地把白鹿文化的强悍与敦厚集于一身，以致在两个家族旷日持久的争斗中，及民族的兴衰演化中，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作品不仅写他修祠堂、开学馆，对长工鹿三待如家人，为弘扬民族宗法文化极尽善事义举；而且还从这个封建宗法文化的维护者身上，抹掉其宗法等级的印记，写他抛却地主兼族长的阶级的或个人的恩怨，始终以仁义、人道、敦柔去化解来自族内与族外的各种矛盾。例如他在农民运动中，曾被戴高帽子游街，而当敌人对农会骨干反攻倒算时，他却不计前嫌，亲自跪下为他们求情；尽管黑娃们打折了他的腰，但他仍竭力营救黑娃，表现了“以德报怨”的广博胸怀。正因为作家是从抽象人性论和生命本体论的角度去揭示和表现主人公的人格力量，因而形成特定民族精神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也就消融到仁爱、人道、敦厚的语言代码之中。白嘉轩的人格精神连同他所营造的仁义

之乡，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了。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和负面，在作品中不但无法找到区分的尺度，反倒更加混沌一体，成为一种抽象的普泛化的东西。由此说明，作者据以表现民族史诗的文化观，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而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和生命本体论为特征的文化观，必然导致对民族心灵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演绎，并在历史与文化的错位中，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失落感和神秘感。

类似《白鹿原》这种审美文化追求的，还有《最后一个匈奴》和《八里情仇》等，这两部作品在探触民族或个人的心灵史时，较好地表现了民族或个人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失为现实主义的新作。然而，这两部作品也存在着把文化观照的结论归入历史发展的结论，以致淡化或消解制约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等缺陷，导致作品缺乏深厚、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总之，这类作品在反映人与环境、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时，一方面强化了自然环境而忽视了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夸大了人的精神本性的作用，而忽视了个体或民族的精神本性的深刻动因是一定社会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及其经济基础，从而使经济、政治、阶级斗争从“大文化”中隐去，精神文化、地域风俗、生命意识成为制约历史演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同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唯物史观是相背离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可见，文学作品在揭示和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的心灵史时，如果抛弃对制约人的生存、发展和民族心灵嬗变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描写或展示；那么，人物的生存状态乃至现实的社会状况是不可能得到真实、深刻反映的，作品的审美文化意蕴也必然是浮浅和虚幻的。这正是《白鹿原》这类小说在艺术探索中的失误所在。

(二)

“陕军东征”文学的代表作品，从人类生命本体论出发去写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又一表现，就是《废都》一类作品的审美取向和文本范式。与《白鹿原》追求史诗式的小说建构不同，《废都》是以传统世情小说的构架为基础，突出了人物灵魂的自我剖析，弱化对世态人情的充分展现，因而更接近于现代中西方一些作家所追求的，带有某种自传体的、剖白灵魂的心态小说。

那么，是否就像作家自己在题头中所说“唯有心灵真实”，即表现当代文化人的一种生存的困窘和躁动不安的灵魂的真实呢？细察作品对庄之蝶为代表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的描写，不难发现作品着力表现的，只是当代文人的负面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几乎没有涉及在躁动不安中革新、进取的当代文人的正面生命状态，因此作家笔底文人的心灵真实，仅代表那些在变革时代中失却了精神支柱，由困惑、彷徨走向颓废、毁灭，具有世纪末情调文人的心灵真实。

因此，《废都》不仅仅由于突出描写了文人的负面状态所折射的社会变革的现实状态是偏狭和不完整的，因而难以揭

示当今时代的真正脉搏和灵魂；更在于作者对这种具有世纪末情绪的文人的描写，缺乏当代意识的审视与批判，浸染着作者亦庄亦禅、调侃自嘲的灰色体验，以致作品的基调是消极、悲观的。

作品中几次出现的，萦绕着西京城吹坝声，一方面点染了古都的社会民俗和文化氛围，颇能勾起人们对乡关、乡愁的眷恋与向往；另一方面，萦绕在城市各个阶层人物心态中的坝声，则是一曲充满悲凉、灰色的主题音乐。

正是在这种悲凉、灰色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作品以主人公庄之蝶的一桩普通官司为线索，以“四大文化名人”的生存窘迫和文化人格的失落为艺术描写的中心，进而写了作家眼中城市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掠影和感觉，由此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的厌恶和逃避。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庄之蝶在社会变革大潮冲击下，尤其在城市文明对其充斥传统农业文化心理的挤压下，生存方式严重失衡，生命意识极其脆弱，以致一桩普通的名誉官司都可以把他煎熬得万念俱灰，无法摆脱，终于走向颓废与毁灭。另一方面，我们还从作家眼中看到城市中人欲横流的种种表象，从政府官员、商人、尼姑到普通居民，从钻营投机者、以权谋私者，到吸毒嫖娼者，而这些的综合感觉则是“废都”现象：是昔日理想的破灭和道德的沦丧；是美好的东西和善良的心灵被扭曲和毒化；是唐宛儿和柳月的堕落与青春的毁灭……这就是作家所感受到的社会人生的幻灭感。这一部分，都是穿插在庄之蝶的官司情节之中，是作为对庄之蝶为代表的失落文人的心态刻画的背景与衬托，因而加重了作品的消极、颓废的基调。以这种不完整、不全面的社会人生当作形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以这种

基调去展现当代文化人的生存状态，这本身就暴露了作家审美视界狭小、心灵空间残缺、文化精神价值失衡。

中外文学创作的历史证明，作家所营造的艺术世界，正是其主体文化、心理作用于社会人生的产物，作家文化人格的高低、残缺或完整，必然或隐或显地体现在艺术世界营造的基调及主要人物的描写之中。同时，中外文化史也一再证明，每当社会变革或阶级矛盾复杂深刻之际，追求文化人格的一些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由于不满现实或不愿趋时、附和之故，总是通过归隐或遁入山林的方式，表现其超越现实的理想品格。所以，其作品倾向于追求文化精神价值，而淡化政治功利性。这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富有个性和审美文化内涵的诗歌流派，表面恬静、怡逸，冲淡、平和，其实包含着不灭的理想闪光，如鲁迅所说，既要论及“悠然见南山”，还要顾及“猛志固常在”，才能完整评价陶潜一类诗家。然而贾平凹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并非这是这一脉，而是类似明清之际某些失落文人在社会变动中所表现的，以麻醉和“自戕”为特征的人生趋附。这从他着笔最多的庄之蝶身上可以看出其端倪。如同贾平凹自己在其“后记”所述：

“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三个字的名字，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

可见，作家所背负的农村文化情结，使他无法适应从传统农业型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变，以致产生失落与悲哀，再加上这悲哀又无法与人诉说而一再压抑下来，一旦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时，终于加重了人生的幻灭感。他正是在这种消极的文化心态的作用下，用他那小生产者的意识和

失落的破碎的心灵去观照这个正在革新发展而又存在着丑陋和阴暗面的多面体的社会人生，他的审美取向的倾斜自然是在社会人生的丑陋面和阴暗面一边。于是，他把眼中这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真实转换成审美观照和创造的“内心真实”；这样，他就在突出描写主要人物的困惑与虚幻感中，找不到失落的真正原因而陷入“虚无”和“自戕”之中。作品写庄之蝶由于找不到出路，只好到女性那里寻找解脱的主要情节，也正是上个世纪末某些小说家笔下的文人曾经经历过的。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谈及清代的“狭邪小说”时所说：这类作品，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指《青楼梦》等）……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尤其自《海上花列传》出，更实写妓家，暴其奸诡……”。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心灵的投影。

有评论者说，《废都》在抨击社会的丑恶现象方面是真实而深刻的。我们从作品的描写中所得到的印象并非如此，相反，这种掠影性的揭露，是以街头巷尾的民谣口诀为其点染的。于是作品加进了那个半疯老头的歌谣，以揭露社会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并以此为线索，把作家眼中的感觉似断似续地连缀起来，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印象，即：整个社会齷齪不堪，充满糜烂气息，触目惊心而又无可挽回。这种旨在暴露而缺乏当代文化批判精神的描写，是情绪化而不是审美化的，只是一种直觉，却缺少理性审视，因而其艺术真实和审美价值是浮泛、模糊与浅层的，难以把人们引向对社会历史的反思。

既然现实社会让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悲观绝望，那么《废

都》的审美理想又寄托何处呢？作者自己茫然，只好让老牛说话。这种农村文化的怪诞话语，既是作者心灵痛苦与焦虑的回声，又是他那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滞后的历史文化观的代码。贾平凹身上的农民意识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也有流露。不过，在《废都》里他更多地写了现代城市的丑恶和把人毁灭的悲剧，而没有写出那些具有当代意识和文化追求的时代新人，因而作品虽然触及城市中的各种人，但他眼中的城市是农村化的，是他那农村文化的视角下的城市，所以他找不到真正代表现代城市生活本质的人物，也就写不出当今城市的真正脉搏和城乡之间在变革中的必然走向。所以说，作品立意在暴露，旨归在逃避；而不是立意在批判，旨归在变革。这就是其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所带来的作品社会审美价值的局限。从而深刻告诉人们：每当国家、民族处于深刻的蜕变时期，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必然经历灵魂的痛苦与挣扎。而真正有作为、有希望的民族和个人，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所写，“凤凰”在大火的燃烧中再生，这才是悲壮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只有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之，才能以当代的审美视界去揭示变革中新与旧、前进与落后，美与丑的冲突，深刻展现人们的各种矛盾和挣扎、开拓与追求，这样写出的作品才具有当代悲剧精神和审美价值。即使达不到这个高度，至少也要写出人们在困惑中的思考、在失落中的选择，哪怕是某种暗示和意向，也多少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此外，《废都》中的性描写，竟占了全书极大的篇幅，这不仅是畸型的审美取向，也是袭用《金瓶梅》等小说的套路。有评论说，作者写庄之蝶的性放纵，与作品着力刻画那种背

负传统旧习、充满封建士大夫情调的文人，在急速变革的时代由于文化人格的失落而走向沉沦的内容密切相关，因为在他的不断变换性对象的感官刺激和肉欲麻痹中，既暴露其灵魂无所依附，只能暂时棲息于女色之乡的窘迫与悲哀；同时也说明，当他那颓废的享乐主义不断泛滥时，灵与肉就越发分裂，而导致人性的彻底泯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还应进一步看到，作者始终把性描写的情节置于全书的中心，不仅写失落文人庄之蝶在性行为的放荡中，所暴露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自私而虚伪的女性观；而且还袒露其抱着玩赏、及时行乐和不以为耻的低级趣味；结合作者在描写中的情感投入，使文艺所应具有的道德批判和审美感丧失殆尽。尤其是其中的某些场面的描写和渲染，更有追求恶趣之嫌。作者对这些封建士大夫式的恶趣和旧式小说的性描写套路，显然是缺乏历史文化批判的，足见其审美价值追求的滑坡，和向陈腐、落后的审美情趣倾斜的严重性。因此，作品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读者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类似的情况在另一部小说《废都》中，更表现出性描写的鄙俗与下作，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而是赤裸裸的扬丑。作为一个有高尚文化精神价值追求的作家，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么！

(三)

与“陕军东征”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追求及文本建构的特点相关联的问题，即其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也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在《白鹿原》为代表的、注重史诗式结构的小说